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回顾、评述与模型建构*

张永成[1] 郝冬冬[2] 宋祎品[1] 王嘉木[1*]
（[1]山东大学商学院 山东威海 264209；[2]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图书馆 山东威海 264209）

摘 要：[目的/意义]明晰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弥补以往“要素说”、“图书馆说”、“图书馆事业说”、“技术说”、“知识说”等存在的缺憾与不足，夯实学科基础与增强学科合法性。**[方法/过程]**在文献回顾和观点评述基础上，基于管理学视角，构建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一个概念模型。**[结果/结论]**图书馆学是具有多维研究主题、多重情境依赖性的应用性交叉学科，图书馆学理应上是图书馆管理学，其研究对象理应是“管理说”，包括图书馆组织、管理主体、管理、管理客体四个研究主题，其中，图书馆是情境和载体，馆员是核心和目的，管理是手段和依据，管理客体是一个庞杂的体系。图书馆员的人性假设是图书馆学的“第一性”。

关键词：图书馆 图书馆学 研究对象

The Research Object of Library Science: Review, Comment and Model Construction

Zhang Yongcheng[1] Hao Dongdong[2] Sonmg Yipin[1] Wang Jiamu[1*]
（[1]Shandong University Business School，Shandong Weihai 264209; [2]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Weihai）library, Shandong Weihai 264209）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Clarifying the research object of library science, so as to make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and deficiencies of the "theory of elements", "theory of library", "theory of library cause", "theory of technology" and "theory of knowledge" in the past, and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of the discipline and enhance the legitimacy of the discipline. **[Method/Process]** 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and viewpoint review, a conceptual model of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object is construc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nagement. **[Result/Conclusion]** Library science is an applied interdisciplinary subject with multi-dimensional research themes and multi-situational dependence. Library science should be library management, and its research object should be "management theory", which includes four research themes of library organization, librarian, management and management object. Among them, library is the context and carrier, and librarian is the core and purpose. Management is means and basis, and the object of management is a complex system. The human nature assumption of librarians is the "first nature" of library science.

Key words: library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object

*本文系山东省社科规划基金“共同价值观、有意识知识溢出与企业开放式创新”（项目编号：19CGLJ1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大学图书馆服务创新生态系统的建构、运行与治理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YJA870008）的研究成果之一。

1　引言

诞生于 1807 年的图书馆学，历经 200 多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为知识传播、人才培养、社会进步贡献自己独特的智慧和价值。图书馆人在为已有成绩鼓舞和欢呼的同时，也感受到了巨大的现实压力：互联网、大数据、AI 等新兴技术普及应用对图书馆事业的巨大冲击；原一级学科“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改为“信息资源管理”，图书馆学变成“信息资源管理”下的二级学科；尤其是，长期以来，图书馆学留给人们的理论架构、研究范式和学科知识体系并非是完全清晰的，甚至学科研究的对象目前仍尚无定论。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图书馆学研究的客体，它规定着图书馆学研究的外延、内涵和本质特征，是图书馆学确立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图书馆学有别于其它相关学科、体现学科独立性与合法性的重要依据。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不同，学术共同体也没有对此达成真正共识，图书馆学仍然是一个让人困惑的领域，其学科定位与合法性备受质疑，图书馆学似乎尚处于“前科学”阶段，且面临学科日趋边缘化的风险。本文在回顾和评述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基础上，从管理学视角，构建了一个概念模型，以抛砖引玉，尝试为明晰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提供一个分析思路。

2　文献回顾

1807 年德国人马丁.施雷廷格出版了《图书馆学教程》、《图书馆学概览》两部经典著作，率先提出并定义了图书馆和图书馆学：图书馆是一个由书籍组成的庞大集合，其目的是迅速地满足所有的文献需求；图书馆学是符合图书馆整理的目的所需的一切命题的总体[1]。随后，杜威的“经营管理论”、巴特勒等人的“跨学科认知论”、阮冈纳赞的“图书馆学五定律”等相继问世。

国内图书馆学界也一直致力于建构本土流派的图书馆学说，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刘国钧的图书馆研究对象说：1921 年提出图书馆是由合法的设备、适宜的管理员、正当的书籍构成的“三要素说”；1934 年提出基于图书、人员、设备和方法的“四要素说”；1957 年完善为基于图书、读者、领导干部、建筑与设备和工作方法的“五要素说”[2]。他认为，图书馆学是关于图书馆的科学，也就是研究图书馆事业的性质和规律及其各个组成要素性质和规律的科学。1981、1991 年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和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合编的《图书馆学基础》及其《修订本》认为，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的学问，是机构之学，超出图书馆边界的研究不属于图书馆学范围。黄宗忠在 1988 年出版的《图书馆学导论》中也进一步确认“图书馆

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是研究图书馆收集、加工、整理、保藏、控制图书与一定社会读者利用藏书之矛盾产生与发展规律的科学”。自此，国内图书馆学的“要素说”、“图书馆说”、“图书馆事业说”自成一体。罗德运、黄宗忠（1999）认为，滥觞于20年代末，到50年代中期臻于完善的图书馆学“要素说”，是中国最早形成的图书馆学体系[3]。吴慰慈等（1999）评价道：直到今天，“五要素说”是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最完整也是最基本的认识，是最具有中国图书馆学特色的理论，是我国图书馆学研究者对世界图书馆学研究的一大贡献[4]。

毫无疑问，图书馆学是一门应用性学科，不仅要学以致知，更要学以致用，以结果为导向，理论研究服务于图书馆组织实践，实践性是图书馆学的一个核心特性。在实践过程中，由于图书馆资源和服务的特殊性，需要利用一些技术来获取、分析、传递和整合资源，尤其是，一些重要的服务创新也是由新技术应用带来的，例如从传统纸质书刊借阅服务向电子书刊访问服务转型等。正如蒋永福（2005）所说，图书馆学的技术情结是抹不掉的，其可信和可贵之处就在于服务效率的提高上[5]。著名图书馆学家杜威也认为，人们往往不是追求什么理论上完整的体系，而只是利用技术工具来设法解决一个实用的问题。因此，诸多学者崇尚技术实用主义和工具理性，从技术应用视角解读图书馆学，而不是将图书馆学置于社会哲学和行为通论中进行分析，“技术促进论”或“技术说”普遍存在，它突出图书馆业务的技术属性，强调技术及其应用对图书馆的决定性作用，似乎技术应用才是图书馆的主业，不搭乘新技术的“便捷快车”就无法体现图书馆的差异性、专业性与“时尚性”，而忽视了技术的工具属性，以及技术应用的单一性和“短命性”，忽视了馆员的主体性、主导性和创造性，忽视了管理的整合性与价值创造性，缺乏对图书馆学核心问题的深度思考和系统概括，由此也导致了我国图书馆学研究“有著述无思想、有潮流无方向、有方法无目标等问题”[6]。

另外，三次工业革命之后，随着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知识员工涌现、知识经济开启，知识的交流、创造与利用等成为学术界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以有效应对环境和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一切皆可知识，一切皆为知识，“知识说”在图书馆学界亦开始盛行：1974和1978年布鲁克斯相继提出了信息科学的知识方程与客观知识说。1985年宓浩、黄纯元提出关于图书馆的“知识交流说”[7]。1992年刘洪波提出“知识组织说”[8]。蒋永福（1999）认为，图书馆本身就是一个知识组织[9]，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客观知识、图书馆、人的相互关系[10]。王子舟（2000）认为，图书馆的实质和研究对象均是知识集合[11]。柯平(2004)以知识资源论为基础提出了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知识资源[12]。事实上，“知识说”是延申施雷廷格对图书馆的解释，即“图书馆是一个由书籍组成的庞大集合”，把图书馆解释为知识组织或知识集合，把图书馆服务活动解释为知识活动，强调知识要素（创造、利用与分享）的重要

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说”仍然倾向于“要素说”或“图书馆说”。

从“要素说”、“图书馆说”、“图书馆事业说”到“技术说”、“知识说”，一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图书馆界一直在试图解答图书馆学到底是研究什么的问题？不同学者理解不同，甚至同一个学者在不同的时期或不同的论著中的表述也不尽一致[13]。对此，魏辅轶等（2024）曾感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无论是具象的图书馆还是抽象的信息、知识，理论成果并未消除我们内心的疑惑，甚至也很难说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究其原因，或许一开始就对图书馆学元理论的理解出现偏差[14]。

3　观点评述

图书馆学的出现，说明了信息、知识及其传播的重要性，它是如下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一，图书馆组织发展的现实需要，这是图书馆学出现的首要原因；其二，杜里、施雷廷格、杜威、阮冈纳赞、洪范五等图书馆学者们的理论贡献，使得图书馆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知识体系；其三，法国的《藏书家通报》、德国和美国的《图书馆杂志》、英国《图书馆》等学术期刊的相继出版，图书馆学者之间的思想争鸣极大地促进了学科知识体系的建立、完善和普及；其四，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计算机等相关学科的迅速发展，从而为交叉学科图书馆学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养分”。

图书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一个“混血儿”，继承了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计算机应用等的基因，理应具有多维研究主题结构，起源于 2003 年的“iSchool 运动”就是其一例实证,因此，图书馆学必然与其它学科研究发生联系，不仅作为“受体”要借鉴其它相关学科的知识，而且要作为“供体”向其它相关学科输出自己的研究成果。因而绝不能固步自封，研究主题单一化，简单地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图书馆，或者说图书馆学就是关于图书馆的学说。当然，尽管跨学科研究能够丰富图书馆学理论体系，但是，如果诸多图书馆学问题都能从相关学科中找到答案，那么拓展学科外延容易稀释图书馆学合法性根基，并非图书馆学研究的主业，而只能作为图书馆学研究的辅助力量。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图书馆学必须建立自己的合法性体系，包括拥有独特的研究对象、专属的研究方法、完善的知识体系等。图书馆学研究的根本问题仍然是有别于其它相关学科的元问题、元理论的研究，尤其是研究对象、学科“第一性”等问题。

从现有的文献看，无论是“要素说”、“图书馆说”还是“图书馆事业说”，甚至是“技术说”、“知识说”，它们实质上都更倾向于“机构说”或“机构属性说”，是以图书馆为研究对象，将视野主要聚焦在图书馆组织上，探讨图书馆组织的定律、权利、目标、使命、理念、

技术应用、业务、流程、职能等问题。毫无疑问，图书馆学是根植于图书馆组织的学问，图书馆组织是图书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图书馆学。但图书馆学并非只是图书馆之学，研究对象并非仅仅局限于图书馆组织。一级学科更改为“信息资源管理”（事实上，笔者认为“信息管理”理应更合适，毕竟“信息资源”比较具体、确定，“信息资源管理”弱化了学科的创造性功能属性，缩小了学科的想象空间，例如“人力资源管理”只是“工商管理”下的一个二级学科）、图书馆学的交叉学科属性、日趋边缘化等的背景下，“机构说”的不全面性、非聚焦性等局限性愈发明显，尽管诸多学者一再呼吁应该改变图书馆学的研究方向，但由于学者们各自观点并不一致，学术界也尚未推出特别有说服力的新学说，以至于时至今日，境况似乎并无根本性的改变[5][15]。

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经历了迟到的起点、持续的徘徊、艰难的起步、漫长的重建、迷茫中的破局和新世纪的光辉等阶段[16]。对于重塑图书馆学研究方向的问题，吴建中（2019）认为，图书馆学研究应从“解决藏、用矛盾为主”向“以人为本”理念转化[17]。肖希明等（2019）主张应秉承“信息、技术和人”三位一体的教育理念，更重视信息领域中“人”的因素，让图书馆的人文传统和价值理性能更加和谐地融合到图书馆学教育之中[18]。他认为，随着“信息范式”、“知识范式”已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主流，跨学科研究成为发展趋势的背景条件下，必须思考图书馆学体系结构是否还应该以图书馆或文献为中心来构建[19]。索传军、戎军涛（2022)则将对不同时期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知划分为机构范式、社会学范式、信息范式、知识范式和人文范式，而范式的演变是社会环境、学科内部因素、学科认知主体与图书馆事业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20]。索传军（2023）也认为,“图书馆学就是关于图书馆的学说”的说法存在较大的局限性，但图书馆可以作为图书馆学应用的一个最佳场景[21]。

没有历史就没有现在。审视、评估和反思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并不是要“去图书馆化”，更不是否定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贡献，而是希望客观准确地描述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正本清源，将图书馆学研究纳入正确的轨道，构建合理、完善的图书馆学知识体系，增强学科合法性，推动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的健康发展。那么，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什么呢？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与国外图书馆学界基本相同，主流观点均是“图书馆管理说”[22]，例如，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洪范五的代表性著作《图书馆组织与管理》就突出强调“管理”在图书馆学和图书馆组织中的重要性。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国内“正统”图书馆学一直被“机构说”所垄断。当初施雷廷格将图书馆学定义为“图书馆整理”，但国内一些学者似乎曲解了施雷廷格的本意，忽视了“整理说”，断章取义地认为图书馆学就是关于图书馆的学问，并且认定这种说法的源头就是施雷廷格对图书馆学的定

义。毫无疑问，图书馆学研究确实需要本土化，为图书馆学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为我国图书馆事业繁荣提供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但绝不能为了本土化而本土化，不能排斥或拒绝那些脱离具体情境的、抽象化的成熟理论或思想。一级学科由“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改为“信息资源管理”，在图书馆界掀起不小的波澜，学者们不断追问、质疑、反思之后，似乎进一步明确了图书馆学的管理学科属性，国内图书馆学研究转了一圈之后，好像又回到了上世纪20-30年代的情景，一些学者开始关注知识管理[12]、品牌建设[23]、服务能力[24]、服务创新[25][26]、文化建设[27]、用户关系管理[28]等图书馆管理问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从2008年开始，由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主办、已经连续举办了十六届的“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创新论坛”，把“图书馆管理”作为其两个核心主题之一。

参考刘迅、张桂凤、庄义逊、况能富等更多学者的翻译与解释[29]，事实上，现代图书馆学的开创者施雷廷格将图书馆学定义为“符合图书馆整理（Einrichtung）的目的所需的一切命题的总体”，就已经为图书馆学研究指明了方向，“整理说”理应就是“管理说”，在当时的背景下，以实现资源、技术、空间等的优化配置和有效利用。显然，施雷廷格也特别强调图书学的实践性，这与管理的实践性不谋而合。“图书馆界的拿破仑”帕尼兹、“公共图书馆运动精神之父”爱德华兹等，都是“图书馆管理说”的典型代表。曾任英国皇家图书馆馆长的杜里在《新式图书馆的管理者》（1650）就明确强调“管理者管理”的重要性。“现代图书馆事业之父”、美国图书馆学家杜威的“读者高于一切”、“馆员培训”、“图书馆‘三化’管理”、“以最低的成本、最好的图书为最多的读者服务”等理念均渗透着“科学管理之父”泰勒的管理思想。另外，从2009年始，柯平教授团队一直进行“国外图书馆学研究热点与前沿分析”的系列研究，结果表明，“基于馆员、用户、服务、能力等的图书馆管理”问题一直是这些年来国外图书馆学界和业界关注的核心[30]。

4　模型建构

图书馆源于图书，图书馆学源于图书馆组织及其实践。然而目前，图书已非图书馆的全部内容，图书的功能亦在逐渐退化，图书馆也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下，“图书馆”与“图书馆学”称谓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无论是“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还是“信息资源管理”，都处于管理学这个门类之下，它们本质上都是研究管理的，进而言之，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管理的一门学问，“管理原理”理应是图书馆学的元理论。另外，借鉴施雷廷格的“图书馆整理说”，以及国内外其他学者的观点，本文从管理学视角，构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一个概念模型，见图1。由模型可见，图书馆学研

究对象包括图书馆（组织）、管理、管理主体（馆员）以及管理客体（其核心也是馆员），其中，图书馆、管理、馆员是三个核心研究主题/对象，所有的图书馆学问题的研究，基本上都离不开上述三个核心主题。在这里，将管理客体界定为图书馆学研究的第四主题，以示次要性区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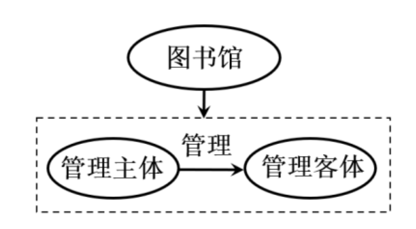


图 1　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一个概念模型

3.1　图书馆（组织）

图书馆学是一门情境科学，首先受限于图书馆组织的内部和外部情境，短期看，图书馆组织是一个控制变量，长期来看，它也是一个调节变量。图书馆学研究必须立足于图书馆组织的公共性、公益性、开放性、平等性、共享性，立足于图书馆资源和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图书馆之间的弱竞争性，以及图书馆与读者之间关系的紧密性和价值一致性，突出图书馆组织的愿景、使命、价值观和目标。

结构决定功能。在资源与读者之间充当“中间人”、“连接者”、“导航者”角色[31]的图书馆组织，是信息中心[32]、知识中心[33][34]、学习中心[35]、文化中心[36]，是一个由要素投入到服务产出的物理转换机构，是对个体服务与市场化服务双向替代的一种团队服务生产方式，其服务生产函数可以表述为：$Q = Mf(R, F, I)$ 。其中，Q 是服务产出，M、R、F、I 分别是指管理、资源（包括书刊、空间、技术等）、职能（包括战略、文化、制度、机制、结构）和创新精神（又称企业家精神）。毫无疑问，在这个服务生产函数中，基于馆员的管理与创新精神是最具创造性和最重要的，按照经济学家熊彼特和德索托的解释，前者意在既定条件下优化配置和有效利用各种资源，实现“循环之流”的静态效率或配置效率；而后者意在寻求打破“循环之流”的动态效率或创新效率[37][38]。服务生产过程就是经过一系列物理转换，将读者需求信息、书刊、空间、技术等投入物转化为服务产出的过程，也是一个价值创造的过程。

图书馆是书刊、空间、技术、职能、馆员等的集合体，更是服务能力的整合体。图书馆真正宝贵的不是馆藏资源，而是建立在资源、职能、馆员等的整合与利用基础上的服务能力[39]，它比资源、技术、空间等任何具体事物都可靠，并与服务绩效（效率和效果）直接相关，能够有效满足读者等利益攸关者的诉求，破解自身合法性难题，是图书馆“是其所以为是”的原因或根据。从这个意义上讲，图书馆组织的本质是满足以读者为核心的内外利益攸关者

需求的服务能力，而“数智”赋能成为图情档发展的新增长点[40]。在环境高度不确定和读者需求日益个性化的背景下，维系终究难以为继，如同企业组织一样，图书馆存在的唯一功能就是服务创新，其能力体系的核心逐渐由传统的服务“制造”能力（满足标准化需求）转变为服务“创造”能力（满足个性化需求）。因此，现代图书馆管理，本质上就是图书馆服务能力管理，尤其是服务创新能力管理。然而，由于图书馆组织自身能力局限性、外部资源的广泛可用性、数智技术的普及应用等因素的交互影响，传统图书馆组织的解释力逐渐丧失，图书馆组织逐渐向图书馆服务联盟、服务网络、服务系统、服务生态系统、服务平台等新型组织形态转型，籍此实现服务（创新）方式的变革，提升服务（创新）能力与服务（创新）的有效性。

3.2 管理

管理分为管理理论、管理方法和管理方式三个层次，通常讲的管理，是指管理方式或管理实践，它具有情境依赖性，取决于图书馆组织外部环境、图书馆组织内部环境、管理主体和管理客体四个方面，参考图 1。作为图书馆学研究的核心主题之一，管理就是立足图书馆组织的资源、服务、服务对象、目标等的特殊性，通过馆领导管理、职能管理与自我管理的动态耦合，营造适宜的图书馆组织秩序（工业化场景下，以人为秩序为主；后工业化场景下，以自发秩序为主），实现增值[41]：（1）吸纳外部各种有用资源（聚集效应）；（2）实现书刊、空间、技术等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效利用（整合效应或配置效应）；（3）培育、激发和释放全体馆员的创造性或“智慧性”（放大效应）。

管理具有科学性、道德性和艺术性，是真、善、美的有机统一，贯穿于图书馆组织及其活动的方方面面，发挥着基础性、整合性、统筹性的功能。管理做得好，图书馆未必能搞好；管理做不好，图书馆肯定搞不好。在图书馆服务生产函数中，管理是将“珍珠串成项链”的整合性价值创造活动。没有管理，“珍珠”只能散落在那里；管理不好，“珍珠”就难以串成更精美的“项链”，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可见，管理是图书馆服务能力的“放大器”，恰如战略管理学家钱德勒所说，“协同是组织的本质，也是管理的核心命题”，正是因为管理的存在，才会产生 1+1≫2 的协同效应，才能“放大”图书馆组织的服务能力，例如，通过管理能够实现“1+1=5”时，产生的增量“5-2=3”就是管理的价值。进而言之，图书馆学就是研究如何实施有效的管理，才能更好地汇聚和利用各种资源，激发馆员创造性，进而“放大”图书馆组织服务（创新）能力的学问。

图书馆管理，就是把平凡的馆员变得不平凡，将平凡的服务做得不平凡，使平凡的图书馆变得不平凡。图书馆管理，必须立足图书馆组织，对标最科学、最标准、最专业的、最富

人性、最有效的企业管理。随着服务供求逐渐从图书馆主权向用户主权过渡，图书馆业务从“制造性”服务为主转变为“创造性”服务为主，馆员从“工具人”转变为“自由人”，管理动机从寻求人为秩序为主转变为寻求自发秩序为主，后现代视域下，图书馆学研究理应从传统的科学管理范式（人是手段、科学性原则与静态效率）为主向人本管理范式（人是目的、人本原则与动态效率）为主转变。

3.3 管理主体/馆员

管理主体是全体馆员，尤其是馆领导。全体馆员既是管理者，也是被管理者，需要被管理和自我管理，并且，要想管理好“物”和“事”，首先要管理好馆员，从这个意义上讲，图书馆管理就是对全体图书馆员的管理。德鲁克在其经典著作《管理的实践》（1954）中明确指出，“管理是一项以人为主轴的事业，人比任何概念都更加值得关注”。

图书馆组织中，读者需求的满足依赖于馆员的服务和服务创新，尽管各种技术应用对于更好满足读者需求是至关重要的，但也必须承认，技术是由人创造的、通常是外来的、物化的事物，技术应用的主体是馆员，技术并非图书馆的“第一生产力”。而图书馆组织中，馆员是知识的主要载体，以及知识创造和利用的主体。由此可见，自由的、富有创造性的馆员才是“第一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智慧生产力”、“可持续生产力”。正如杜威所言，“馆员不再是保管员，而是活跃和进取的教育力量，就像路标一样，总是为别人指明方向”。因此，图书馆管理必须以馆员为本，要尊重人、依靠人、培育人、发展人、激发人、为了人；必须释放馆员的创造性，实现由“被动制造”到“主动创造”的跨越，以有效应对环境与服务创新的不确定性。

追本溯源，任何学科都存在“第一性”或“元”问题。“第一性”是一门学科的“知识内核”，是研究对象的逻辑原点，只有内核明确、坚实、有力，才能铸造牢固的“学科大厦”。作为研究人、人的行为的一门学问，管理学的“第一性”就是人性假设问题，即在每项管理措施背后，都必有关于人性本质及人的行为的假定。作为管理学的一个二级分支，图书馆学是一门关于图书馆管理的学问，而图书馆管理就是对图书馆员的管理，或者说，图书馆学研究的核心、焦点也是人和人的行为问题，而不是资源配置、服务产出、社会效益等物的问题、事的问题、阶段性问题，因此，图书馆学的“第一性”理应是图书馆员的人性假设。这里，综合斯密、米塞斯、凯恩斯、哈耶克等经济学家，以及马斯洛、德鲁克、沙因等管理学家的人性假设，概括性地认为，工业化/确定性背景下，图书馆员的人性假设倾向于主流经济学的人性假设，即“经济人、信息充分、完全理性”，籍此发扬图书馆员的工匠精神，既定条件下寻优解，重点满足读者的标准化需求；后工业化/不确定性背景下，图书馆员的人性假

设倾向于奥地利学派的人性假设，即“富有创造性的复杂人、信息不充分、有限理性”，籍此培育、激发和释放图书馆员的创新精神，打破既定约束条件、开辟新服务，重点满足读者的个性化需求。总之，从个体主义方法论而非整体主义方法论出发，从自由的、富有创造性的复杂人假设而非经济人假设出发，把人当目的而非手段，无论是图书馆理论的研究还是图书馆组织实践，其最终指向就是图书馆文明的方向。

3.4 管理客体

作为图书馆学研究的第四个主题，管理客体包括馆员、资源体系、职能体系、能力体系、服务（创新）体系、绩效体系，见图2：其中，馆员的研究内容包括人性、需要、动机、价值观、行为准则、文化、素养、能力等，馆员也是管理客体的核心，是服务及其创新的主体，有助于实现图书馆的“智慧性”；职能体系是图书馆的基础架构和保障机制，包括图书馆的制度、结构、机制、文化、战略等；资源体系包括纸质资源、电子资源、空间资源、软硬件系统等，是服务的内容和工具，其中的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有助于实现图书馆的“智能性”；能力是书刊、空间、技术等资源整合性利用的结果，能力体系包括服务能力、服务创新能力等指标；服务体系包括借阅服务、讲座培训、教研支持、数据服务、空间服务等具体内容，相应地，服务创新体系是由上述各种服务的创新活动构成的；绩效是图书馆满足读者需求的评估结果，绩效体系包括服务绩效和服务创新绩效。整个管理客体是一个层层嵌套的体系，以馆员为核心，通过对馆员、资源体系、职能体系的积极管理而建构起来的服务（创新）能力，作用于服务（创新）活动，决定着其绩效，而服务（创新）的“第一性”或“元问题”就是读者需求特性，因此，服务（创新）管理本质上就是馆员创造性/创新精神与读者需求特性之间感知、响应和连接的过程，是“两性合一”，也是检验图书馆存在的市场合法性过程。所有管理客体共同构成一个持续地评估、反馈与迭代的逻辑闭环。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开放、合作背景下，图书馆组织与外部利益攸关者建立各种联系，组建成各种中间性组织形态，相应地，管理活动也溢出组织，延伸到外部利益攸关者那里，例如用户关系管理、资源供应商管理，甚至是图书馆治理等，以创建良好的服务（创新）生态，更好地满足服务（创新）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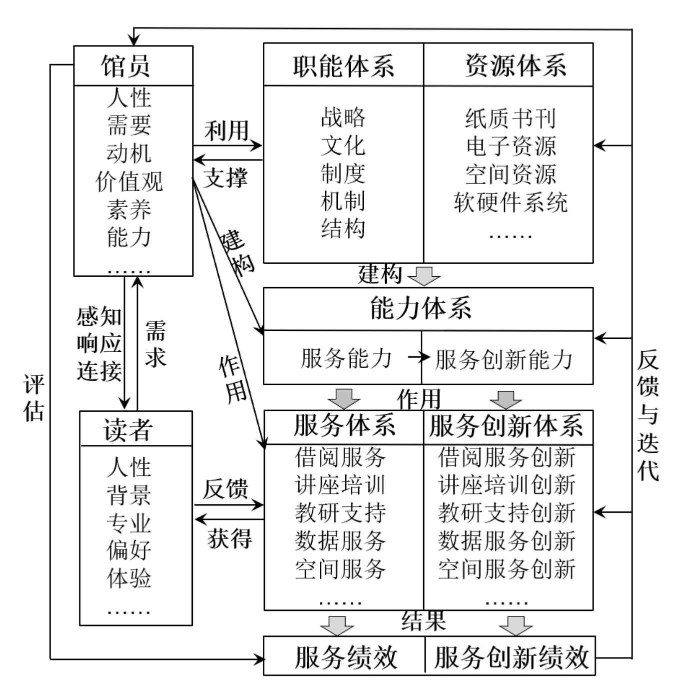


图 2　管理客体的构成要素及其关系

5　结语

一门学科，既需要不断地发现和积累新的理论，丰富学科知识体系；更需要去伪存真，查明、废弃不必要的薄弱理论或错误理论，夯实学科根基。国内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大体经历了“要素说”、“图书馆说”、“图书馆事业说”、“技术说”、“知识说”等，但如果将图书馆组织看作图书馆学研究的唯一对象，显然是作茧自缚，动摇了图书馆学的合法性根基，制约了图书馆学的发展。

无论是从管理学这个学科门类、“信息资源管理”一级学科背景来看，亦或是参考诸多国内外学者的观点，还是着眼于图书馆服务实践，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都理应是“管理说”，如此才能赋予图书馆学以创造性价值属性。将图 2 嵌套在图 1 之中，两者整合在一起，就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全部内容，从中，我们就更能够准确理解图书馆学的应用性交叉学科属性、多维研究主题结构和多重情境依赖。图书馆是图书馆学研究的根基，管理是图书馆学研究的“生命”，服务创新是其使命或历史责任，未来图书馆学研究，理应置于管理学的框架之内，立足图书馆组织，结合图书馆目标与特性；以馆员为中心，关注馆员的创造性和智慧性；强化管理的核心职能，营造适宜的图书馆组织秩序，“放大”图书馆组织的能力，筑牢“安身立命”的根基。在围绕三个“核心主题”的基础上，尤其要关注服务能力、服务创新能力、学习能力等的培育、建构与管理，开拓进取，以实现良好的服务（创新）绩效，证明图书馆组织存在的市场合法性。

参考文献

[1] Schrettinger M． Handbuch der Bibliothek-Wissenschaft esonders zum gebrauche der nicht-bibliothekare welcheihre Privat-Bu chersammlungen selbst einrichten wollen; auch als Leitfaden zu Vorlesungen uber die Bibliothek-Wissenschaft zu gebrauchen[M].Wien: F. Beck,1834．
[2] 刘国钧.什么是图书馆学[J].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1957（1）:1-5.
[3] 罗德运,黄宗忠.刘国钧先生和中国图书馆事业[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99（6）:1-7.
[4] 吴慰慈,刘兹恒,张广钦.刘国钧先生的图书馆学理论思想发微[C]//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甘肃省图书馆. 一代宗师-纪念刘国钧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158-167.
[5] 蒋永福.再问图书馆学的科学性与研究方向问题[J].2005,31（157）：5-10.27.
[6] 程焕文,刘佳亲.图书馆学研究的使命、问题与方向[J].图书情报工作,2020（1）:20-24.
[7] 宓浩.知识、知识材料和知识交流-图书馆情报学引论（纲要）之一[J].图书馆学研究,1983,4:28-35.
[8] 刘洪波.图书馆知识组织的新思路[J].图书与情报,1992,1:1-7.
[9] 蒋永福.图书馆与知识组织[J].中国图书馆学报,1999,25(123):19-23.
[10] 蒋永福.客观知识·图书馆·人-兼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3(5):11 - 15.
[11] 王子舟.知识集合初论-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探索[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0,26（128）：7-12.
[12] 柯平.知识资源论-关于知识资源管理与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J].图书馆论坛,2004,24(6):58-63.
[13] 崔汭.刘国钧《什么是图书馆学》经典化研究[J].图书馆论坛,2023,9:46-53.
[14] 魏辅轶,袁梦佳.抽象之上皆为建构具象之下皆为情景-图书馆学的一种元理论研究[J].图书馆建设，2024.
[15] 龚蛟腾,王璐,易凌.一级学科更名背景下图书馆学发展的机缘、困境与出路[J].国家图书馆学刊,2022(6)：3-12.
[16] 范并思.图书馆学理论道路的迷茫、艰辛与光荣-中国图书馆学暨《中国图书馆学报》六十年[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7,43（227）：4-16.
[17] 吴建中.从“书的图书馆”到“人的图书馆”-赫尔辛基中央图书馆给予我们的启示[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9（5）：93-97.
[18] 肖希明,倪萍.新中国 70 年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与变革[J].图书与情报,2019（5）：1-12.
[19] 肖希明,沈玲.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的历史发展与当代构建[J].中国图书馆学报,2021,47（253）：4-22.
[20] 索传军,戎军涛.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历史演变与成因分析[J]中国图书馆学报,2022,48（261）：28-42.
[21] 黄令贺,孙晓萍,宋莉.当代图书馆学理论的使命与进路-第八次全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讨会综述[J].国家图书馆学刊,2023（6）：106-112.
[22] 周文骏,金恩晖.图书馆学[A]．图书馆学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16-17．
[23] 陆长玮.品牌赋能:高校图书馆品牌资源的开发策略与应用场景研究[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3（5）：26-32.
[24] 王英,叶兰,赵雅,杨巍,左少凝.高校图书馆数字学术服务能力成熟度模型构建研究[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3（5）：49-61.
[25] 刘宇初,李峰,刘素清.高校图书馆创新能力提升策略研究[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3（1）：87-93.
[26] 王新才,谢鑫.图书馆服务创新的目的、动力源与制度设计[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8(5):17-22.
[27] 刘细文,涂志芳.学术图书馆数据文化建设的思考与探讨[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3（6）：20-25.
[28] 陈建龙,赵飞,及桐.基于信任理论的北京大学图书馆用户关系管理新探[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4（1）：11-16.
[29] 徐跃权,徐兆英,刘春丽.马丁.施雷廷格的图书馆学思想与贡献[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6,42(224):37-50.
[30] 柯平,张瑜祯,潘雨亭等.2022 年国外图书馆学研究热点与前沿分析[J].文献与数据学报,2023,5（4）：099-117.
[31] 吴建中.未来二十年,图书馆是什么模样[J].图书馆杂志,2023,11（391）：4-9.

[32] 黄宗忠.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与进展及其评价(上)[J].晋图学刊,1998,(2):1-10.
[33] 王子舟.图书馆学是什么[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74.
[34] 柯平.重新定义图书馆[J].图书馆,2012,5:1-5.
[35] 吴建中.人·技术·价值观-关于下一代图书馆技术的思考[J].图书馆,2019,4:1-4.
[36] 程焕文.图书馆的价值与使命[J].图书馆杂志,2013,1:4-8.
[37] 约瑟夫.熊彼特.郭武军,吕阳译.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p56-57.
[38] 赫苏斯.维尔塔.德索托.朱海就译.经济学的新探索[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21,14-24.
[39] 刘炜.作为数字人文基础设施的图书馆:从不可或缺到无可替代[J].图书馆论坛,2020(5):1-2.
[40] 孙建军,李阳,裴雷."数智"赋能时代图情档变革之思考[J].图书情报知识,2020(3):22-27.
[41] 初景利,黄水清.从"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到"信息资源管理"——级学科更名的解析与思考[J].图书情报工作,2022,66(14):3-9.

[作者简介]：张永成，男，1973 年生，山东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郝冬冬，女，1972 年生，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图书馆副研究员。
宋祎品，女，1978 年生，山东大学商学院讲师。
王嘉木，男，2000 年生，山东大学商学院硕士生。